

70多年前,美国政府曾多次派人到延安面见毛泽东,提出美军准备在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杭州湾登陆,要求中共部队配合作战。毛泽东为此精心谋划,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今天让我们回眸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944年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多批次人员到延安面见毛泽东

1944年6月9日,包括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在内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延安访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先后会见了记者团成员,毛泽东还和记者们合影留念。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介绍了中共抗战的情况,公布了七年来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大家交流了对今后反法西斯战争的看法。

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期间,提出要成立一个观察组,并到延安访问,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同意。7月22日,美军赴延安观察组第一批人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的率领下,由重庆飞抵延安,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秘书易登随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多次会见了观察组并与之深入交谈。该组有关人员在访延期间,写出了多份报告。

8月7日,美军驻中国战区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又选派人员组成第二批美军观察组,由重庆飞抵延安,组长仍由包瑞德上校担任。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又热情地会见了观察组全体人员,并分别与包瑞德和组员谢伟思进行了多次重要谈话。10月8日晚,毛泽东还在一次小型舞会上和谢伟思等多名美国人跳舞,并幽默地对谢伟思说,中国共产党要与美国的政策“保持一致”。谢伟思先后写出50多份报告,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呈报给上司。11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

人代表赫尔利又飞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到机场迎接,还陪同他检阅了由一个连队排列成的仪仗队。8日,毛泽东、周恩来又与赫尔利进行了会谈。

美国人一拨又一拨到延安,肩负重要使命。美国人的情报很准确,他们清楚地知道,国民党的部队远在大后方,八路军各部队分布于华北。中国东南沿海浙江、上海、江苏,特别是杭州湾周围,都是中共领导的新四军。他们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交谈的内容虽然很广泛,包括政治、军事、外交等很多方面,但有关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进展,下一步的作战计划等,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

毛泽东三次电报指示新四军准备配合美军登陆

新四军下辖七个师和一个游击纵队。其中第一师在江苏中部地区,第三师在江苏北部地区,浙东游击纵队足跨杭州湾,战斗在从四明山到浦东的沿海地区。第二师、第四师、第五师、第七师则分布在内地。因此,能配合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作战的,只有第一师、第三师和浙东游击纵队。

1944年8月21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电报,发给新四军军部。毛泽东在电报中说: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军配合作战。五师地区美军正派人去,我们已许其设无线电网并供给情报。不久他们即将派人来军部,并在上海及沿江、沿海设无线电网,其目的不但便利空军轰炸,并且准备为将来登陆作战取得配合。美

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在很远。因此,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

侵华日军总部为了破坏盟军在中国登陆,于7月18日发出了“浙东作战命令”。日军相继攻占了由国民党军驻守的温州、丽水等地,以控制海岸线。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于9月27日致电华中局,要求大力加强苏浙皖地区的工作。电报说: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的发展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建议作如下部署:一、浙东游击纵队派一支得力部队约两个团,到天台山去发展天台、黄岩、临海、乐清等地工作,沿公路、沿海岸线进行游击,创造游击区。背靠四明山,用推进方式向敌伪区进军……二、向天台山脉进军后,依据可能程度……相机挺进至平阳山区与龙跃部队会合,造成该区(浙南)的扩张形势。龙跃地区(龙跃部活动的地区)的基本任务是:沿温州及浙、闽交界的海岸线,力求蔓延式地发展,海岸线愈长愈好。三、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阵地外,中心任务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本文指南京)杭国道伸入天目山,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形势。浙东区委应加强金华、义乌、衢县、桐庐、富春(富阳)等地敌伪区的游击工作,以迎接苏南部队的南进。中共华中局接到中央指示后,进行了认真研究部署,并于10月9日电告中央汇报了执行情况。



群众支援下,始终战斗在湖泊棋布、河道纵横的苏常太三角地区,在阳澄湖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的奇迹!

崔左夫展笔挥毫,开始在历史的意象中描摹和书写新奇瑰丽的篇章。为了最大限度逼近历史真实,崔左夫特意找到时任南京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当年曾创作过175团团歌《你是游击兵团》的词作者过鉴青。过鉴青是无锡人,曾任新四军6师18旅教导大队政治教员并做52团宣传股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地方,后来师承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而学有所成。崔左夫还找到了《你是游击兵团》的曲作者、当年从华中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分配到新四军6师18旅52团的文化干事、后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青年处处长(相当于现青年局局长)的黄苇,专程拜访了当年任中共澄锡虞工委委员、新四军江南保安司令部所属警卫1团政治处主任的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包厚昌、曾在“江抗”任过组织科长的南京军区军史编辑室的谭肇之等人,其中屠淑芳作了长达一周的认真回忆,订正了一些重要史实。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施光华,当年随何克希从上海“特科”来到“江抗”,与刘飞、朱一多有接触,熟悉“江抗”在苏南马鞍形发展的斗争历程,人称“江抗”活字典,他给崔左夫介绍了“江抗”东进前后的大量情况。“秋风起、蟹脚痒”。菊茂蟹肥时节,崔左夫收获了苏南之行的宝贵成果: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斗争纪实》诞生了!作品虽然只有7000字,但充满了江南水乡特有的风土人情和生活气息,生动传神地展现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苏南水网密布地带敌我犬牙交错斗争的瑰丽画卷,读来饶有兴味。显然,作品题目是由陈毅作词 of《新四军军歌》中“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一句歌词演化而来。崔左夫将稿子打印200份,分送有关部门和当年阳澄湖斗争亲历者征求意见,并作为“解放军30年征文”送交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那时他当然无法预想,就是这篇浸透着特定年代历史气息、充满了苏南地区生动鲜活的湖上特色、武装斗争与地下斗争交相辉映、浸透军民鱼水情的未定稿,成为后来剧作家们打造红色经典的滥觞!

32.喝茶与洗澡

道光三十年(1850年)清道光皇帝驾崩,王室颁诏天下:国丧三年,停止演戏,等于规定平民百姓要戴孝三年,老百姓不能看戏,唱戏的艺人岂不喝西北风了?当时昆戏班尽是苏州人,有个叫钱文元的,打了一个“擦边球”,他把昆戏改为清唱,不登台演出,一律坐唱,在茶馆里演戏。于是,那些茶客们一边喝茶,一边就听戏,既不触犯王法,又能满足茶客们听戏的需求,不卖戏票,只付茶钱。随即“茶园”之名传遍上海,所有戏园,都以茶园名,同桂轩就先后改名为红桂茶园、丹凤茶园,著名茶馆青莲阁的前身是华众会茶园,旧址在现福州路外文书店,当年楼上卖茶,楼下百戏杂陈,有西洋镜、哈哈镜、幻灯片、珍禽异兽等供人参观。

民国以后至抗战时代的孤岛时期,沪上茶馆业逐渐走向衰落,一些晚清极负盛名的老字号茶馆因门庭冷落纷纷关门,但数量增多的小茶馆及“老虎灶”式的平民茶馆仍能吸引不少社会底层的茶客。而“老虎灶”就是卖热水的“小店铺”,早先这种烧开水的大炉,埋口大铁锅,靠里面又砌两口小锅,人们从远处望去,两口小锅像双眼,大锅像老虎的血盆大口,那通向屋顶的高高烟囱,极像一条竖起的老虎尾巴,故而上海人皆称这种店为“老虎灶”。

老虎灶的发展为老上海社会下层阶级的休闲提供了理想的去处,而且除了泡开水,它还逐渐兼营起洗澡和茶馆的生意,“混堂”的出现就与这种开水业的发展有关。中国有浴池的历史可上溯到北魏以前,大多由佛寺和宫廷设立。民间开设的浴堂约始于宋代。中国沐浴多为多人合用一池,池水在一天内不更换,因池水混浊而被叫做“混堂”,上海人把赶在浴室刚营业时去洗澡叫做“赶头汤”“头汤浴”等,到浴室洗澡也叫做“孵混堂”。在上海,执浴室业牛耳者大多是苏北扬州人。于1917年开张,设在天津路497号的“浴德池”在当时是上海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浴池。此外,与“浴德池”比肩并称为沪上三大浴池的“卡德池”“日新池”也无一例外由扬州人开设。

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的劳工大众,住房普遍拮据,到了冬天洗澡就成了问题。常将“老虎灶”和“孵混堂”合二为一,喝茶与洗澡,同时还可以听到各种消息,也算是身心休息的小世界。这种混堂一般都附设在老虎灶旁边,用一条细铅丝挂一块布,沐浴的人就在这个帘子后面过一把洗干净身体。那地方滚烫的热水是尽用的,浴客把一个盛满热水的大木桶拎到帘子背后去,再拿一个有柄小木桶舀了热水往身上浇……当然,讲究享受的上海人还流行一句“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老话,即早上起来要去孵茶馆喝茶,茶水一口一口灌到肚子里;吃好晚饭后要去孵混堂,把身子泡在热气腾腾的大池内,一般开销惠而不费。

“酒吧”完全是一个舶来品,从英文“Bar”音译而来,上海人称“酒吧间”。“吧”字本意是一根横木。在美国西部,牛仔和强盗们很喜欢聚在小酒馆里喝几口。因为他们都是骑马而来,所以酒馆老板为方便他们拴马,便在馆子门前设了一根像栅栏一样的横木,后来汽车取代了马车,骑马的人也少了,这些老旧的横木也被拆掉了。有的酒馆老板不愿意扔掉这已成为酒馆象征的横木,便把它拆下来放在柜台下面,没想到却成了喝酒客人垫脚之处,柜台下放横木的作法普及开来。由于横木在英语里合作“Bar”,故人们索性就把酒馆称作“酒吧”了。

说起上海酒吧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十九世纪,来上海的欧美人在黄浦江边的东大名路开出了第一家欧洲式的酒吧。上海在顶峰时有十二万常住户的外国人,他们给上海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娱乐场所——酒吧。那个时候能够到霞飞路梯梯斯喝咖啡,听白俄罗斯拉小提琴,去礼查饭店跳家乡舞,到丽娃丽姐去划船,这些活动是在上海的外国人物质、文化和信息交流的必需品。洋人占辟租界,为了侨民的生活享受,有夜总会、俱乐部、旅舍公寓等设施,内部都附设“酒吧”,各列强的“烂污水手”都嫌官办的酒吧间拘束,难以放肆纵欲。为此,上海的中外商贾们投其所好地开办出私商“酒吧间”。

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

高建国

20.《血染着的姓名》诞生

新中国成立的礼炮,转瞬就响过了9载。抗美援朝胜利后,第20军59师驻防杭州。担任师文化科副科长的崔左夫,忙得像一只高速旋转的陀螺。从1946年8月,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刊登崔左夫的处女作《开赴前线》后,他一发不可收,始终笔耕不辍。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文化工作出版社出版了崔左夫第一部著作《胜利的创造者》;1951年3月,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报告文学集《淮海前线目击记》;抗美援朝期间,崔左夫不幸负伤,在医院用左手完成了记录抗美援朝光辉历程的《战斗在长津湖畔》一书并出版,该书获得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因左手著书,故改名左夫。崔左夫始终不敢淡忘刘飞在淮海战场的嘱托。36个伤病员的故事像一块奇异的磁石,时时在吸引着他。1957年夏,崔左夫受命到苏南收集红十三军和苏南抗日斗争史料,在上海见到了当年“江抗”总指挥部部秘书长、曾写过《猛将吴焜》的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陈同生,意外获得了1939年“江抗”东路36个伤病员在阳澄湖坚持敌后斗争的简要材料。这使他喜出望外。这年全军开展“解放军30年征文”活动,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数名作家和记者集中采访。崔左夫得以重返苏南实地采访两个多月,像一只采得百花酿佳蜜的蜜蜂,辛劳竟日,收获颇丰。令崔左夫感奋不已的是,两个月的采访,他已经能够令人信服地解析始终让国内外一些军事专家感到困惑的战争奇观:在东有上海、西有南京、南有杭州,处在大城市包围中且交通发达的平原水乡,日伪军的据点像梅花桩般占据了各个乡镇和交通要道,尤为严峻的是,1941年7月起敌人实施“清乡”行动,用竹篱笆把各个村分割封锁起来,巡逻艇日夜穿梭来往于河道水网之中。但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以刘飞、夏光为首的新四军伤病员及其发展起来的部队,在党的领导和人民

醉上海

仲富兰

